



现代性 与物欲的释放

· 杜维明先生访谈录

现代社会以日益复杂的制度和日益发达的媒体激励，劝诱人们以努力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其价值导向的实质是物质主义。著名学者杜维明和卢风在对话中着力探讨如此粗俗的价值观何以能成为强有力地影响制度的主流价值观。

杜维明 卢风◎著



现代性 与物欲的释放

杜维明先生访谈录

杜维明 卢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杜维明，卢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300-10096-8

I. 现…

II. ①杜…②卢…

III. 价值论（哲学）-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664 号

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

——杜维明先生访谈录

杜维明 卢 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4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这个访谈录源自我从2007年6月21日到7月15日对杜维明先生的七次访谈。杜先生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和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讲座教授。^①这七次访谈的第一至六次都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最后一次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官邸中进行的。

有机会访问杜先生，是因为此前受他邀请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万俊人教授曾建议我找机会采访杜先生，我想这个访谈录可表明万教授的建议是个很好的建议。在2007年8月回国后，我请清华哲学系的博士生张容南女士把访谈录音转录成文字，并叮嘱她严格按录音转录。张容南女士为此付出了辛劳，特在此表示感谢！访谈录文字稿出来以后，我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做了一些语言上的修饰，并按访谈顺序为每次访谈记录加了标题（一级标题），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杜先生。杜先生让他的秘书为他打印了纸质文字稿，并积极为仔细地从头到尾对文字稿做了修改和润色。杜先生的修改稿出来以后，我又仔细校阅了一遍，为每次访谈记录分段加了标题（这是杜先生建议的二级标题），并又做了一

^① 杜维明先生自1996年始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2008年6月卸任，现为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讲座教授。

些语言上的修饰。这个文本完全是按访谈的时间顺序编辑的，故两级标题只是大致点题的阅读导引，二级标题也未必紧扣一级标题。访谈录不是专著，它呈现的不是逻辑体系，而是活生生的思想和智慧。

以下我将按自己对杜先生思想和这个文本的理解，理出贯穿于这个文本的几条线索，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反思启蒙是杜先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向度，我也一直在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做批判性的反思，于是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导向成了我们谈话的中心话题。

我把现代性理解为西方启蒙之后逐渐形成的西方主流思想和社会建设目标。当然，它已成为今日世界的主流思想和社会建设目标，即现代性规划正在全球得以实施，尽管它也遭到各方面的严重质疑。就思想维度而言，现代性涵盖自由主义（其中蕴涵个人主义）、经济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就社会建设目标而言，现代性统摄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现代性指导下的社会和文化改造（或变迁）过程就是现代化，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的社会（和文明）就是现代社会（和文明）。

现代社会与所有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现代社会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而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洪水猛兽。这与现代社会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深深影响现代制度建设和变迁的价值观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难得之货”（如科技含量高、造型精美的汽车），这显然是极为粗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此粗俗的价值观居然能成为主流价值观，能指导制度建设，约束制度变迁，并且影响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原因何在？这是我特别想问杜先生的问题。杜先生的答案是：表面上似乎是自由主义的流行！其实物质主义是粗俗的，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也不够精致，但自由主义是经过无数思想家论证的精致的政治思想体系，论证自由主义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现代制度建设的基本理据是由自由主义提供的，而不是直接由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的，更不是由粗俗的物质主义提供的。

自由主义标举自由与人权。自由主义及其指导的制度的允诺是：给个人以最大自由！个人自由的界限就是他人的自由，即，只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怎么都行！平等也是现代性张扬的基本价值，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张力。给每个人以同等的基本尊重，或给每个人以同样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平等。自由与平等都要求消除对不同族群的歧视，例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等等，更要求消除对不同信仰的政治歧视。在反对信仰歧视的自由社会里，人们对人生意义（或人生价值）的不同理解难分高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许再被区分为高贵的和卑下的，高雅和低俗之间的界限也趋于模糊了。这样一来，在传统社会一直受压制和歧视的物质

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①，在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庇护之下，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典范，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他们是以追逐利润为“天职”^②的人们。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资本的逻辑”^③便逐渐成为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逻辑。于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逐渐“大化流行”！

当然不能说自由主义蕴涵物质主义，它只是把自由凸显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也特别主张给每个人以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你可以不信仰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虔诚地信仰某种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宗教，但在现代社会你必然被视为多少有点古怪和过时的人，因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通过制度削弱了一切真正强调精神超越的宗教和人生哲学。实际上，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宣称经济学可解释一切人类行为时，就已把经济主义提升为一种哲学，它可以借助经济学而全面地指导人们的价值追求。“经济学家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④，自由主义者大多不反对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经过现代媒体

① 在传统社会，他们大多是商人。商人可能很富有，但不尊贵，如传统中国的士大多不屑与商人为伍。

② 这与他们持有宗教信仰不矛盾。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并行不悖，因为新教承认创造财富也是荣耀上帝的方式。所以，现实中的以赚钱为“天职”者可以同时是个宗教徒，他甚至还可以是个慈善家。

③ 从逻辑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指资本的定义：资本就是处于投资过程中的能增值的资产。能增值的资产才是资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必须通过人们的投资经营，资本才能增值。于是，表达为现实生活之行动律令的“资本的逻辑”就是：要尽力让你的资产增值！

④ [英] 约翰·布鲁姆著，王珏译：《伦理的经济学解释》，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的“包装”，就体现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经过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就成为全面指导大众生活的“科学”^①。科学总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了真理的光芒，岂能不“大化流行”？

自由主义当然是支持民主政治的。^②著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似乎认为，民主社会难以避免物质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多数表决原则，即当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就公共事务产生分歧时，通过表决以形成决议，表决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物质主义者们就借助民主制度而成为社会的中坚，“资本的逻辑”就借助民主制度而成为支配社会的“逻辑”。现代民主社会不承认任何人凭其信仰或境界而表现的卓越，但承认人们在商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所表现的卓越，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又离不开商业，于是，商界巨子（卓越者）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能让发达的媒体通过广告和艺术传播他们的理念，从而强有力地影响公众，亦即他们能有效地争取多数人支持他们，从而使立法和政策制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为了让资本增殖，要求大众消费，于是大力宣传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的实质乃是物质主义。

那么，可否由此否定民主的积极意义呢？杜先生认为不可。反对信仰歧视是对的，统一信仰是专制和暴政的特征之一。民主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以思想自由，而保障思想自由的

① 它又不同于各种专门科学，因为它已成为罗尔斯所说的“整全性信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即全面指导人们意义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带着科学光环的哲学或宗教。

② 但自由主义并非唯一的能支持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是要求尊重个人自主性的政治。现代民主因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而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流行，但它毕竟尊重了多数人的选择。如果我们希望民主框架能生发抑制物质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就只能寄希望于大众价值观的改变。杜先生相信，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现世中转化现世的努力），可以抑制社会的市场化趋势，从而抑制物质主义的影响。在民主框架中，制度与大众观念显然始终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制度对大众具有激励、劝诱、胁迫的作用，大众意志又能改变制度。在现行制度仍受“资本的逻辑”制约的条件下，杜先生对思想精英寄予较大希望。他心目中的思想精英大约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颇似儒家讲的“先知先觉者”，为改变现代制度和大众观念，仍需要“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当然，先知者只能在民主框架内发挥作用，即只能先说服公众，再进而影响制度。

西方启蒙之后，虽然政教分离了，但宗教在西方仍有较大影响。宗教在当代美国的影响尤其大。据杜先生说，美国有50%的人上教堂。按说宗教是极为重视精神超越的，那么美国文化又何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呢？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十分清楚，也十分深刻，可参见本书第三部分的“宗教与物质主义”一节。

杜先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泛道德主义的批判，他肯定现代文明的积极成就，如对个人隐私和权利的保护、现代慈善事业等。如果政治制度不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基本权利，就会导致把完全不要自我利益的“雷锋精神”强加于人的错误。

我们都认为，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

极其危险的。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人没有必要通过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成正比。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实际上存在多种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途径，许多途径都比努力赚钱、尽情消费更直接地通向人生幸福，但现代主流价值观和现代制度抑制了一切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生活方式。说它是极其危险的，是因为几十亿人的物质主义追求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用杜先生的话说就是，它使人类文明成了一列刹不住的列车，不扭转方向，它就会坠入毁灭的深渊。

这是危机，也是契机。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如全球升温），生态主义的先知们或可说服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放弃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走更有创意地追求意义的道路。当生态价值观成为多数人的价值观时，制度变迁将能摆脱“资本的逻辑”的制导，人类将有望走向生态文明。

二、进步主义与文明的可比性

“进步”与“发展”是典型的现代性用语。进步主义是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进步主义“抹杀文化多样性，同时又装出充分承认这种多样性的企图”，“把诸古老或遥远的人类社会的差异状态，当做是某种发轫于同一起点又趋于同一目标的单一发展的诸阶段或时期”^①。即进步主义

^① 清河：《破解进步论》，见〔法〕莱维·斯特劳著，清河译：《种族与历史》附录，10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相同的起点，也将经历相同的发展或进步阶段而最终趋于同一目标，只是同一时期的不同文化展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如 17、18 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文明阶段（狩猎与采集），而欧洲人已进入现代文明阶段（工业）。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进步主义已受到严正质疑，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低于现代西方文明，当代中国因为还没有赶上西方的文明水平，当然仍低于西方。

其实进步主义的文明观（或历史观）依赖于黑格尔式的、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包括现代认识论和现代历史观。现代知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不断积累地进步的，科学知识的积累甚至体现为真理向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的汇聚；科学知识甚至正日益趋近于终点（“奥米伽点”），即趋近于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正因为如此，科学理性之光终将驱除人间的一切黑暗。杜先生认为，如今这种思想正日趋式微。诚然如此。20 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60 年代革命”、分析哲学的当代成果以及当代科学的演变趋势都能印证杜先生的断言。更健康的观念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可凭科技而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方式，但不可能穷尽对自然奥妙的认识，因为自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事物都是无限复杂的，自然永远都隐匿着无限的奥秘。

现代历史观典型地体现为黑格尔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演变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我们可根据被揭示的历史规律去评价一切文明的发展水平，并预测社会历史的未来走向；奠基于历史决定论之上的文明评价

是客观的（或科学的）、全面的、整体性的评价。显然，这种历史观与上述的现代认识论密切相关。现代认识论（和科学观）认为人类有能力建立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以保证人类在宇宙中为所欲为。现代历史观认为，人类有能力发现历史演变的所有奥秘（历史规律），进而确立评价一切文化或文明的整全的标准，建设统一模式的理想社会（“世界大同”或“历史的终结”）。依此标准，一个文明（如中国传统文明或印第安文明）一旦被评定为低级的文明，那它就绝对是低级的文明。

杜先生认为，如今已没有几个严肃的思想家接受这种历史观了。许多当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拒斥这种历史观，而是用具体的人类学、历史学证据去反驳这种历史观。如莱维·斯特劳斯说：“史前考古知识的发展趋向于认为，各种文明的形式是铺展于空间而非如我们以前乐于想象的那样是序列于时间。”进步并非必然，亦非持续，各文明的演变过程表现为跳跃形式。“这些跳跃并不总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愈行愈远，而是伴随着方向的改变，有点像国际象棋中的骑士，总是有好多种行进的方法，但从来都不是朝同一个方向。进步的人类与其说像一个拾级而上的人，每登一级都在他已征服的台级上再增加一级，不如说像一个赌徒，他的运气取决于好几个骰子，每扔一次便看到骰子四散在地毯上，带来不同的数目。人们在一个骰子上赢了，却总是在另一个骰子上输掉的风险。只是偶然在某些时候，历史才是积累的，即，各数目相加得出一个有利的总和。”^①如果我们

^① 清河：《破解进步论》，见[法]莱维·斯特劳斯著，清河译：《种族与历史》附录，112~1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这么看待各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就必须拒斥现代的历史决定论，承认不同文化都有其相对于人类特定需要的优点，接受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正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接受。弗朗西丝·福山当然是个例外，他继承了黑格尔传统，故认为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带来了“历史的终结”。

拒斥了黑格尔传统的、进步主义的现代历史观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发现什么客观、整全的文明评价标准，从而使我们能全面、客观地对各种不同文明进行整体性评价。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文明是不可比较的呢？并非如此。杜先生认为，虽不能对不同文明进行整体性比较，但可以就文明的特定维度进行具体的比较。例如，拿现代文明与一切前现代文明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现代文明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技的飞速进步。^①

如果我们就政治、经济、科技、道德这几个维度来比较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文明）就会发现，现代经济和科技无疑是进步的，但说现代政治比前现代政治进步会引起较大争议，说现代人的道德比前现代人的道德进步会引起更大争议。杜先生对民主没有失去信心，他大约同意现代政治优于前现代政治的观点。我也认为现代政治优于前现代政治，因为现代政治的最大优点是，制度不允许统治者（或治理者）压迫、欺凌被统治者（或公

^① 只是不能认为现代经济的无止境增长和现代科技沿征服自然方向的进步是绝对的好事。

民)，因为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

我曾借助梁启超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来评价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从而认为在成熟的现代社会，由于政治的进步，公共道德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有所进步，但私人道德却没有什么进步。杜先生认为，应该把“私人的”（private）与“自我的”（personal）区分开来。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区分是易于误导人的，不如把道德区分为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与自我道德（personal morality，亦可曰“个人道德”）。自我道德是奠基于个人信仰的道德，信仰不同，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就不同。公共道德是民主社会对所有公民的规范要求，任何人违背公共道德都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更正。依杜先生的分法，我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在经济、科技、政治和公共道德方面都比传统社会进步，但人们的自我道德却不比前现代人高尚，原因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受到了现代商业的侵蚀，而杜先生特别提到了现代美国基督教所受到的侵蚀。例如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教时说：“假如你信教，就要什么有什么。”可见，当代宗教已受到物质主义的严重侵蚀。物质主义的流行就是人们自我道德堕落的明证，现代性或现代化根本没有使人们的自我道德得以提升。针对西方，我们不能说由众多人追求灵魂拯救（在中世纪）到众多人追求物质财富的社会变迁是一种道德进步；针对当代中国，也不能说由众多人知足常乐（如中国农民大多知足常乐）到众多人贪得无厌是一种道德进步。

现代社会使公共道德大致体现为不同信仰者（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儒者、自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经济主

义者)在道德方面的重叠共识。如现代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或基本权利),敬重(遵守)按公平程序制定的法律。现代法律和公共政策以公共道德为道德依据,所以,公共道德是社会成员集体行为的根本道德指南。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使自己的自我道德与公共道德相协调,但这决不意味着公共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与“资本的逻辑”激励的集体行为正对地球生态系统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尽快减压,地球生态系统就大有崩溃的危险。所以,改变公共道德,进而改变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要把反对浪费、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要求纳入公共道德范畴,但非到多数人摒弃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且信奉生态价值观时,反对浪费、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就不会蔚然成风。就此而言,公共道德的改变依赖于人们自我道德的改变。

三、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可以获得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支持,信仰(或思想)多元主义则可以获得哲学和哲学史、科学和科学史的支持。当代的复杂性科学、耗散结构论、生态学等都不再支持机械论世界观(或物理主义世界观),而支持生成论的世界观。普利高津说:“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① 这便意味着,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不能把

^① Ilya Prigogine,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The Free Press, 1997, p. 72.

大自然设定为具有不变构成要素、结构、形式或秩序的存在 (being)。既然如此，试图把所有自然奥秘都纳入一个逻辑体系（统一的科学知识或真理体系）就是痴心妄想！

西方人一直心存发现统一真理的梦想，在哲学与科学不分的古代，是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在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中世纪时人们相信，真理最终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只有神学才能总领真理的探究，于是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力图把神学整合成一个严整的逻辑体系。启蒙之后，西方人相信，凭人类理性即可逐渐建立真理大全，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真理，还包括道德科学 (moral science) 真理。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实证科学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发现威力，使传统的思辨哲学相形见绌。于是，哲学把发现经验知识的任务全部推给科学，把本已任务只定位于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这就承认哲学已无力建构有实质（经验）内容的真理体系了，但它还能帮助科学家和普通人正确地使用语言，以避免在无意义的问题上徒费工夫。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仍未放弃一个无比宏大的使命——统一科学。他们试图把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收揽在一个内在一致的真理体系内，然而他们没有成功！实证科学曾因受到推崇而妄自尊大。19 世纪末的物理学家曾相信，物理学将因发现全部物理规律而终结。然而直至今天，物理学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找到统一四种作用力的数学表述。尽管仍有某些著名科学家没有放弃统一科学的梦想，但现代科学和哲学已通过对逻辑性和确定性的最执著的追求显示了一个结论：人类没有能力发现或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其原因是：（1）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参见普利高津的论

述)，自然奥秘之总和不是科学的认知对象，它根本不可能被揭示为一个逻辑体系；（2）人类语言（包括科学语言）和生活世界中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不确定的^①；（3）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有多种逻辑。

如果发现或建构统一真理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健康的心态就是：放弃任何追求统一真理的梦想，由衷地接受文化多元主义和思想多元主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相对主义，即认为所有不同的思想都同样正确，或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呢？

杜先生多次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可认同多元主义，但不能接受相对主义！杜先生多年的思想努力之一是，批判“启蒙心态”的独断面向，同时避免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表达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我认为，在愉快地接受多元主义的同时避免相对主义，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之一。

“文明对话”是杜先生多年研究和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文明对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区分不同文明的优劣，不能在绝对的坐标轴上按先进程度排列不同文明的等级。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值得其他文明学习的东西，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说：我是绝对自足的，无需向任何其他文明学习！有此体认，就不会把文明对话仅当做一种政治策略，而会在对话中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我个人从杜先生那儿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人生态度就是“学习态度”。杜先生认为，在文明对话中，“学习”是比“宽容”更谦逊的态度，学习代表一种真正摒除了无知和傲慢

^① 参见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2-48.